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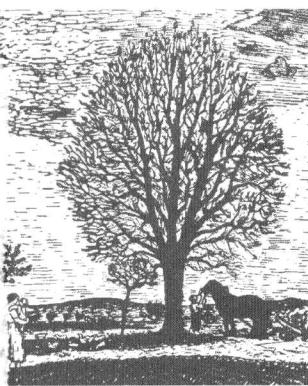


英国19世纪出版制度、 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 创作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shing System,
Reading Ethics, and Romantic Poetry Composition
in 19th-Century Great Britain*

张 鑫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英国19世纪出版制度、 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 创作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shing System,
Reading Ethics, and Romantic Poetry Composition
in 19th Century Great Britain*

张 鑫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 19 世纪出版制度、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关系研究/张鑫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309-08106-0

I. 英… II. 张… III. 诗歌创作-研究-英语-19 世纪 IV.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5649 号

英国 19 世纪出版制度、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关系研究
张 鑫 著
责任编辑/查 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5 千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106-0/I · 615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朱光潜先生在谈及美学治通之道时曾说：“勤钻资料忌空谈，放眼世界需外文。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①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于我来说大抵如此。虽没有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般的写作态度，但是本书从选题到最终付梓亦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首先，在各种“后”（Post-）、“反”（Anti-）、“新”（New-）、“超”（Super-）学迭出的年代，选择“浪漫主义诗歌”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极有可能在“神马都给力”的背景下被斥为一次不给力的敷衍了事。其次，在英国浪漫主义经历域外两个多世纪的研究、国内一个多世纪的解读后重拾此课题，势必背负沉重的“影响的焦虑”，而且“在已经被分离出来的纷呈复杂的（英国）浪漫主义诸特征之间，似乎只有一些家族相似性，而难以找到一个最小公分母”^②。最后，国内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基本上是以论文见长，近几年鲜有专著推出，现有的几部专著也都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体研究，而将几位经典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放在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研究他们诗歌创作的专著几乎没有。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书的推出就是在如此宏观与微观研究背景下产生的。

认为出版制度和阅读伦理是构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

①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4页。

② Lilian Furst, *Romanticism*. London: Methuen, 1980, p. 72.

两大不可或缺因素的观点并非笔者首倡,只是国内尚无此方向的涉足和关注罢了。在过去的 10 年里,国外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已经开始有由内而外转向的趋势,尤其是关于 19 世纪英国整体教化水平的提高、出版体制的变更和阅读伦理的变化与诗歌创作和经典化之间关系的话题更是被专家学者屡屡提及。选此课题一方面有笔者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阅读感受和对比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希冀此课题能为国内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所以,本书的重点就放在浪漫主义前后英国出版制度的更迭,阅读之邦兴起时整个国家阅读伦理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动的社会历史事实对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和济慈等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上。本书前半部分聚焦 19 世纪前后英国的出版制度和阅读伦理的发展变化以及新的历史特色,并论及在这种背景和氛围中出现的诸如“文学名流”和“文学星系”等关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与发展的新现象。后半部分分别以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等四位浪漫主义诗人为解读对象,着力探讨在不同的出版制度和全新的阅读伦理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观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典化的历程。

传统、权威和经典形成,一直是布鲁姆的研究主题,其“影响诗学”或“焦虑法则”理论被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誉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最大胆最有创见”的文学理论^①。在其“诗学误读”四部曲中^②,布鲁姆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具有辩

①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186.

② 分别是:《影响的焦虑》(1973) (*Anxiety of Influence*), 《误读地图》(1975) (*A Map of Misreading*), 《卡巴拉与批评》(1975) (*Kabbalah and Criticism*), 《诗歌与压抑》(1976) (*Poetry and Repression*)。

证意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他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辈大师及前世经典的影响,并会由此在脑海中产生受到约束的焦虑;为了建立自己的创作特色和经典地位,后来新人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大师们的创作模式,必要时和他们进行“竞争”(agon)。关于文学巨擘间“影响”与“竞争”的概念,历史可谓悠久,传承可谓绵长。莎士比亚在其创作初期曾为众多杰出的“大学才子”派所围绕。在他的“诗敌”(Rival Poets) 14行组诗中,莎氏将那些与其同世相争的对手称为“健在的诗敌”(living rivals),而将那些业已去世的对手称为“熟悉的魅影”(familiar ghosts)。浪漫主义文史学家贝特(Jackson Bate, 1918—1999)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他的研究发现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日益增长的对原创性的关注,一种弥漫于整个文学界的自我意识、沮丧和压抑情绪十分显著,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精神状态;他还讨论了在过去巨人的阴影下和历史的重负中,现代人是如何变得虚弱和不堪一击的^①。浪漫主义研究专家纽陵(Lucy Newlyn, 1954—)也曾提出,读者对不同作家的接受往往影响他们声名的确立和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作家经历的焦虑既源于历史又源于未来,所以大多数诗人都有“接受的焦虑”^②。

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立足现在、探讨前驱作家或传统对后来诗人或作家的影响、揭示文学发展本身即是后来新人面对前代大师的焦虑以及勇于与前辈大师竞争的结果。但是,仔细考察这些理论后不难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面向过去一味探求创作主体内心的单一方向模式。对于读者—作者—出版界之间复

① Jackson Bate, *The Burden of the Past and the English Poe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70, p. 4.

② Lucy Newlyn, *Reading, Writing, and Romanticism: The Anxiety of Reception*. Oxford: Oxford UP, 2000, p. 1.

杂的多重角色关系,以及过去—现在—未来间的多维视角,要么重视不够要么直接略去。对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明争暗斗的文学家们所面临的面对“同行竞争”(sibling rivalry)或“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s)鲜有提及。故此,本书的研究在工具性的方法论上和理据性的观点上都有别于传统。求新是愿望,不落窠臼、避书“满纸荒唐言”是心愿。

是为序。

张鑫

2011 年 12 月于金华

目 录

导言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新视野?	1
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6
I. 研究背景	6
II. 出版体制、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关系 研究的发轫	11
III. 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16
第二章 19 世纪英国的出版制度	18
I. 出版体制与书籍印刷	18
II. 高度垄断与高度联营	20
III. 19 世纪的新发展	22
第三章 阅读之邦、“英国诗人”与阅读伦理	24
I. 阅读之邦的形成	24
II. 经典“英国诗人”的形成	28
III. 新的阅读伦理	32
1. 书刊的推动	33
2. 图书馆的普及	36
3. 大众创作的兴起	38
4. 阅读伦理的新转换	39
第四章 文学名流体系、偶像崇拜与文学星系	52
I. “文学名流”体系	54
II. 声名崇拜与偶像阅读	57
III. “文学/商业星系”模式	73
第五章 浪漫主义诗人与新阅读伦理和出版体制	78
I. 拜伦:诗人名望与读者欲望	78

1. 表演性诗人、窥视欲读者	79
2. 出版策略与阅读造势	92
3. 游记文学借用与拜伦的“剽窃”	109
II. 济慈:去后留名、写为大众	122
1. 去后留名、跻身诗人之列	123
2. 写为大众、成就经典地位	144
III. 华兹华斯:原创性、版权保护与泽被子嗣	152
1. 诗人原创与版权保护	153
2. 祖传主题与泽被子嗣	172
IV. 柯尔律治:理想性读者、创造性阅读	179
1. 寻求理想读者、贬抑低劣评论	180
2. 探索精神载体、倡导创造阅读	188
结语	193
后记	203
参考文献	205

导言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研究新视野？

“浪漫主义”是迄今为止定义最多的一个术语^①，而且都被无效地保留下来，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一直以来就只是一个萦绕在文史学家脑海中的白日梦。浪漫主义常常被人提起，但却并不代表任何清晰切实的所指。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目标越是远大、范围越是宽泛，论述就越是滑向空洞和单薄的危险。浪漫主义研究领域最审慎、最杰出的文史学家 A·O·洛夫乔伊(A. O. Lovejoy, 1873—1962)早在 1924 年就指出，我们应该把“浪漫主义”当作一个多义词而不是单义词来用，“‘浪漫’一词已经用来指太多的事物，以至于它本身的意义已经变得虚无了。它已经不能行使一个语言符号的功能了”^②。尽管洛夫乔伊研究了近两个世纪的观念史，希冀揭开浪漫主义的多重网结，但令他绝望的是，事关浪漫主义的诸多观念之间竟然相互抵牾，有些甚至毫不相关。所以，他的门徒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 1891—1980)后来曾戏谑地说：“在洛夫乔伊对浪漫主义做出界定之后，人们可能不会再去谈论浪漫主义真义何在的问题了。”^③但是，研究难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研究意义的

① 鲁卡斯在《浪漫主义理想的衰落》中就总结出了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达 11 396 条之多。参见：F. L. Luca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tic Idea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3.

② A. O.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 *Romanticism: Points of View*.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0, pp. 67-68.

③ George Boas, *French Philosophie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6, p. 218.

空洞或研究主题的虚无。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浪漫主义的确存在，它的确是个中心概念；它的确引起了思想革命。”^①力有未逮的浪漫主义研究是一个具有雅努斯面相(Janus' face)的难题：一方面使世代的研究者心有不甘，因为他们的成果总是阶段性的；另一方面又使后来者跃跃欲试，因为他们面前的空白话题总是不计其数。

浪漫主义诗歌常常被作为浪漫主义的代名词，因为提起浪漫主义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和济慈等为主的几位经典诗人，诗歌也是浪漫主义的主要表现方面。自从弗兰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 1773—1850)于1802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论骚塞的《毁灭者塔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算起，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不但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也为后世研究留下了深重的“影响的焦虑”。可以说，关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并不比浪漫主义诗歌著述本身有任何狭小之处。任何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都未能阻止卷帙浩繁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成果的出现，而且经年之后总有新作。不管是针对6位“超经典”的老牌“主流诗人”，还是针对“影子经典”的“非主流诗人”^②，现当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在背负“影响的焦虑”中愤然前行，并占据了7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领域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经典代读”与“读图取向”大有取代传统细读方式的趋势，但是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民间兴趣与专业研究却并未真正湮没在文化快餐消费主义的洪流中。

①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② “超经典”指老牌的“主流作家”；“反经典”则指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作家，他们属于强势思想、文化和写作中的反主流文学；而先前的一些“非主流”作家则变成了“影子经典”。参见：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汪小邻译，2007年第1期。

多重冲击之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出现些许式微是在所难免的,但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文学地位却是无法撼动的。虽然规范经典不是易事,但诸多标准异背后的共性还是存在的。不管是艾略特的“成熟”标准,还是博尔赫斯的“读者”标准;无论是布鲁姆的“重读”标准,还是卡尔维诺的“记忆”标准^①,它们都指出了经典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普世性与无法耗尽性。综观今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阅读和研究接受状况,它依然保持着上述两个堪称经典的标准。尽管人们阅读和研究的热情被冲淡了,忠诚与神秘感也渐趋消退了很多,但一成不变的“正在重读”的整体趋势表明,卡尔维诺的经典标准——“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②——依然适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典永在、阅读依然,唯一变化的是研读方法与品评策略而已。综观世纪以来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艾布拉姆斯倡导的“反映论”(mirroring)视角和布鲁姆首倡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模式一直被作为主要研究模式而竟相传承,虽时有翻新但并未摆脱“新瓶装老酒”之嫌。当代英国传记作家、知名的浪漫主义研究专家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 1937—)曾针

① 艾略特认为:“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参见: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57页。博尔赫斯认为“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第3页。布鲁姆提出了一条测试经典的“经典”之法:“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页。卡尔维诺的“经典”定义之一是“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以忘记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②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对这种延续不退的浪漫主义研究现状提出“一种关注文本的外部关系”研究^①。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在以威廉·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 1937—)和安德鲁·本涅特(Andrew Bennett, 1939—)等为主的学者的推动下,在坚持爬梳历史、钩沉脉络、品评文本和鉴古喻今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一种新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视角开始渐露头角,并迅速得到世界浪漫主义研究者的关注与青睐。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开始尝试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尤其是六大经典诗人的创作——与史上长期以来未被关注的出版体制和阅读伦理联系起来,探讨除了“内在化”和“反映论”模式下诗歌创作、经典形成与其他重要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兴研究者将交叉学科与多维视角运用到了他们的研究中去,研究的问题涉及阅读的兴起及其后果、版权制度的发展与经典形成、阅读习惯与作品流行、盗版对诗歌发展的影响等。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具有为论证某种特定观点和先验视角而先期形成,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色彩,只是对个别诗人在阅读伦理与出版制度影响下的发展作了简单描述,并未就鲜明时代背景下的整体发展作系统研究。

本书将分别从新“阅读伦理”形成的社会角度、出版制度变更的政治角度、“写为后世”的创作心理角度等出发,通过文史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着力研究新的阅读伦理观和不同出版体制对经典诗人创作的影响,分析六大诗人作品和理论中受阅读伦理和出版制度影响的决定性显现;从而达到拓宽浪漫主义研究思路,提出新的创作成因说,将浪漫主义时期历史—读者—诗人关系正本清源。本书的展开将遵循以下具体思路而展开。

1) 首先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永久版权法的终止和国

^① Marilyn Butler, “Plott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Narratives of Romantic Poetry and Criticism”. *Romantic Revolutions: Criticism and Theory*. Eds. Kenneth R. Johnson, Karen Hanson, and Herbert Mark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0, p. 142.

家审查制度的废除背景研究入手,研究推动阅读人数增长和诗歌成为教学内容现象,以及“阅读之邦”雏型的出现。

2) 接着,研究 19 世纪中期恢复永久版权制后,阅读诗歌人数的增加、新的“阅读伦理”的形成,以及最终导致“阅读之邦”与“教化之邦”接近局面的产生。

3) 然后,以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等为例,着力研究浪漫诗人对新“阅读伦理”的认识和在出版制度制约与影响下,出现的“文学名流”和“写为后世”创作转向,以及对诗歌“经典化”认识的变化;

4) 最后,联系在当今呼唤个性、呼吁多元文化学术领域的现实要求,提出浪漫主义研究应该走出史上形成的“内在化”和孤立化模式,建议将客观历史文化背景与诗人主观意识相联系,从一个更高和更新的视野来研究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本书以新的出版制度和阅读伦理为基本背景,预期得到以下双向价值。

1) 理论价值:重新审视史上相关研究“内在化”、“个性化”和“政治因缘”的理论,形成探索影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和经典产生的历史因素与“文学因缘”的新方法;突破以诗人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有利于揭示历史—读者—作者间的三维动态联系对该时期诗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2) 应用价值:将“阅读之邦”的崛起、阅读大众读书习惯的变更以及出版制度的变化等历史、社会背景引入本课题,有助于澄清当前人们对经典形成的错误认识;有助于在当今“读图时代”或“经典代读时代”,划清“流行作家”与“经典作家”的区别;并为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读典”活动做理论支持。

不管笔者的期望与能力是否事与愿违,但新的尝试与探索总比原地踏步或人云亦云要值得称道。至于是否算得上开辟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新视野,还需读者拭目以待,所以本节的标题带了问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I. 研究背景

本书的中心议题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与新的出版体制和阅读伦理之间的关系。鉴于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而且目前国内该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加之研究的出发点依然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所以有必要首先对 20 世纪以来的国内外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作一个重点回顾,然后集中讨论本书的话题。

最早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的,可以称这一时期的研究为“革命式”。主要研究成果有从 1802 年起弗兰西斯·杰弗里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系列论“湖畔派”诗人的文章、道顿(Eward Dowden, 1843—1913)在 1897 年推出的《法国革命和英国文学》、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在 1919 年发表的《卢梭与浪漫主义》,以及巴尊(Jacques Barzun, 1907—)在 1943 年发表的《浪漫主义和现代自我》^①。这些研究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但都以革命,主要是法国革命与英国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其研究涉及法国政治革命、民主化趋势、民粹主义、激进主义与极权思想等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剧变之间的关系。正如

① 参见:Eward Dowd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Kegan Paul, 1897;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 New York: Riverside Press, 1919; Jacques Barzun, *Romanticism and the Modern Ego*.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3. 第二本著作的中文译本请参见: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巴尊所说,“浪漫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话题”^①,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也并未囿于历史革命范式很久。

二战以后,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人文思考的内心转向与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关注,先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政治—革命性研究模式逐渐让位于以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 1912—)、布鲁姆为代表的内在化研究模式。1953年艾布拉姆斯的经典性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横空出世,立即在学界引起轰动。该书虽然专注于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是因为它对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做的全面回顾与整体评价和总结,并明确提出文学批评四大要素说,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论美学研究的提出与饯行到现在依然为坊间所乐道。20世纪50、60年代正当北美思想界掀起一股强烈的反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浪潮时,由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 1929—)、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 1928—)和哈罗德·布鲁姆组成的“耶鲁四人帮”以其曲折的文风、独特的阅读、多样的阐释和尖厉的批评而将形式主义批评推向发展的终点,将以浪漫主义为批评内核的内在化评论发扬光大。其中号称“文学百科全书式的当代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更是以系列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文章而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内在化批评推向极致。他的《追寻罗曼司的内在化》即是“英国浪漫主义可以称作是罗曼司的复兴。不只是复兴,还是罗曼司的内在化”^②的宣言之作^③。

① 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侯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②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③ 参见: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P, 1953. Harold Bloom, *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 Essays in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0.

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史上,理论的各领风骚也常出现在经典文学的文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更迭上。20 世纪 80 年代,各种“后学”甚嚣尘上之时,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的后学转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尤其是与新历史主义的结盟最为引人注目。新历史主义的诞生,彻底颠覆了关于“历史与人”的一些古老命题,并以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①。可以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历史主义范式是一次真正的由“内在说”向外因说、由唯心论向唯物论的转变,它非常关注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与欧洲大陆的历史政治背景之关系^②。该方向代表作有列文森(Marjorie Levinson, 1953—)的《华兹华斯鼎盛时期的诗歌》,巴特勒(Marilyn Butler, 1937—)的《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艾伦·刘(Alan Liu, 1960—)的《华兹华斯的历史感》和辛普森(David Simpson, 1962—)的《华兹华斯的历史想象》等^③。

世纪之交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呈现出多元状态下以“女性主义”研究为主的模式。在以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为基本阅读阐释理论的前提下,一批研究者开始对浪漫主义的经典文本和重要创作理论进行重读,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沃尔森(Susan Wolfson, 1950—)的“女性化济慈”,霍曼斯(Margaret Homans, 1952—)的“济慈阅读女性、女性阅读济慈”,梅勒(Anne K. Mellor, 1941—)的

①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56 页。

② 参见: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国文学评论》2008 年第 4 期;张旭春:“没有丁登寺的(丁登寺):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范式,”《国外文学》2003 年第 2 期。

③ 参见:Marjorie Levinson, *Wordsworth's Great Period Poems: Fou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6; Marilyn Butler,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Oxford: Oxford UP, 1981; Alan Liu,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P, 1989; David Simpson, *Wordswort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oetry of Displacement*. New York: Methuen, 1987.